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清真集校注
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# 清真集校注

〔宋〕周 邦 彥 著

孫虹校注 薛瑞生訂補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清真集校注/(宋)周邦彥著;孫虹校注. —北京:  
中華書局, 2002

(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)

ISBN 7-101-03593-0

I. 清… II. ①周…②孫… III. 清真集—注釋  
IV. I222.8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2)第 068980 號

責任編輯: 李肇翔 劉尚榮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清真集校注

[宋]周邦彥著

孫虹校注 薛瑞生訂補

\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

\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22 印張·424 千字

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-4000 冊 定價: 38.00 元

---

ISBN 7-101-03593-0/I·456

## 序

孫虹女士，是薛瑞生、楊海明先生的高弟，於我亦有不棄之誼。多年來，致力於宋詞研究，近以大著《清真集校注》問序於我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周邦彥與蘇軾、辛棄疾、姜夔四家，是兩宋詞壇的臺柱，領袖一代。他們的創作，直接或間接影響了宋詞的發展，成爲後來豪放與婉約詞風的兩大源流，備受歷代學者的關注。或就此四家詞集而言，皆列在宋人所有詞集之前位。總體整理校注，則尤爲顯著，其中可數薛瑞生《東坡詞編年箋證》、鄧廣銘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、夏承燾《姜白石詞編年箋校》成就最高，影響最大。而被王半塘譽爲「千古詞壇領袖」的周邦彥，多年來雖有校點本或校注本面世，但總不盡如人意，對此，未免是宋四大詞人詞集整理中的缺憾。

周邦彥以不羈之才，寄情於詞，渾厚雅正，纏綿蘊麗，采蘇、秦之長，開姜、史之始。下字運氣，皆有法度，是兩宋詞壇的詞家大綜。誠如陳世焜所言：「詞至美成，開合動蕩，包掃一切，讀之如登太華之山，如掬西江之水。」然邦彥人品，陳氏不察，現經薛瑞生先生與孫虹女士考證，得曾經依附蔡京，白璧之瑕，實乃其污。邦彥詞品雖高，人品却不能得共臻，未免令人歎惜。

孫虹女士，傾其所學，孜孜矻矻，幾經寒暑，終成《清真集校注》之作，既填補了宋四大詞人詞集整理校注之缺憾，又保存了前人之學術成果而多創獲。隨着社會改革開放，詞集整理研究，亦與其它學術一樣，日趨完善提高，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。創新，自是學者研究之目標，所得成果亦不一般。《清真集校注》彙校勘、注釋、辨證、集評於一爐，尤「辨證」一項，用力為多。道前人所未道，發前人所未發，至為可貴。或閱讀，或研究，一冊在手，幾可盡獲。孫虹女士不辱師門，亦不負讀者。是為序。

辛巳菊月平湖葛渭君。

## 前言

### 一

周邦彥是北宋後期著名詞人。關於他的資料，雖不至湮沒無聞，然可見可信者殊為寥寥。後人作為研究周詞主要依據的三種資料有《宋史·文苑傳》、《東都事略·文藝傳》、《咸淳臨安志·人物傳》。另外史部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、《宋會要輯稿》亦有零星記載；說部中如王灼《碧鷄漫志》、莊綽《鷄肋編》、王明清《揮塵錄》、《玉照新志》、張端義《貴耳集》、周密《浩然齋雅談》等也有論及；介紹略詳者有樓鑰《清真集序》、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。然資料之間相互抵牾者甚多。為周邦彥詞編年，自鄭叔問始；王國維、陳思旁收遠紹，作《清真先生遺事》（以下簡稱《遺事》）、《清真居士年譜》（以下簡稱《年譜》），輩路藍縷，頗啓後人之思。其中以王氏用力最勤，功效最著。現經薛瑞生先生及筆者反復考索，作《清真事迹新證》一文（以下簡稱《新證》），於前人多有指瑕糾謬之處，以《新證》結合周邦彥可確考的一百八十五首詞作，其生平、行誼、仕履略已班班可考。

周邦彥生於宋仁宗嘉祐元年（一〇五六），卒於宋徽宗宣和三年（一一二一），歷仁、英、神、哲、徽五

朝。少年時期生活在故鄉錢塘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。約於神宗熙寧六年（一〇七三）——熙寧八年（一〇七五）游學荊州（今湖北省江陵一帶），其間於熙寧七年（一〇七四）二三月間至秋季曾短期游長安（今陝西省西安市），於深秋返回荊州。《少年游·南都石黛掃晴山》、《虞美人·廉纖小雨池塘遍》、《玉樓春·大堤花艷驚郎目》、《一落索·杜宇催歸聲苦》、《點絳脣·臺上披襟》、《長相思·好風浮》、《月下笛·小雨收塵》、《南浦·淺帶一帆風》等均寫於荊州或宜城、郢州。而且詞人在《迎春樂·桃溪柳曲閑踪迹》、《綺寮怨·上馬人扶殘醉》中還憶及這段生活。邦彥一生，曾兩游長安。少年游長安，自荊州經宜城至武關或湖城入陝，返時亦由此程。《蘇幕遮·燎沉香》、《西河·長安道》（鄭文焯校云：「此詞諸本并無題，准以前作，當是長安懷古」）、《風流子·楓林凋晚葉》等十數闕詞即寫於此時。《浣溪紗·不爲蕭娘舊約寒》等三首詞，則寫於別長安時。熙寧八年（一〇七五）晚秋，詞人從荊州返故鄉途中，寫於金陵的《齊天樂·綠蕪彫盡臺城路》以「荊江留滯最久，故人相望處，離思何限。渭水西風，長安亂葉，空憶詩情宛轉」，回憶了在荊州、長安的游歷。《醉桃源·菖蒲葉老水平沙》表明詞人於「金英垂露華」之時，即是年深秋回到錢塘。

熙寧九年（一〇七六）四月辛亥，其父周原卒（見劉永翔《周邦彥家世發覆》，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》一九九六年第三期），邦彥依制丁外艱居錢塘家中。至元豐元年（一〇七八）抑或元豐二年（一〇七九）（「二年」據陳思《年譜》）入京師。其詞《西平樂》自序云：「元豐初，予以布衣西上，過天長道中。後四十

餘年，辛丑正月二十六日，避賊復游故地，感歎歲月，偶成此詞。「宣和三年辛丑（一一二一），上距元豐初正四十二年。約至元豐五年（一〇八二），入太學爲外舍生（詳見《新證》）。元豐七年（一〇八四）三月辛酉，因獻《汴都賦》詔爲試太學正，寄理縣主簿尉。《少年游·并刀如水》、《一落索·眉共春山爭秀》、《鳳來朝·逗曉看嬌面》、《望江南·歌席上》、《蘭陵王·柳陰直》之類的京師游冶之詞，約可確定作於此時此地。

元祐三年（一〇八八），按宋時官制，初仕及選人外任遠州的常例，由選人出任廬州（今安徽合肥）教授。元祐四年（一〇八九），仍在廬州任上。但陳思《年譜》認爲，此年夏季方有教授廬州之命，歸杭後再赴廬州之任：「自元豐二年游京師，至本年，已十年矣，故《鎖陽臺》懷錢塘云：『淒涼，懷故國，朝鐘暮鼓，十載紅塵。』《玉樓春》又云：『滿頭聊作片時狂，頓減十年塵土貌。』此二詞皆本年春作。教授廬州之命當在夏間未赴任前，先歸杭州，故《驀山溪》有『十載却歸來，倦追尋、酒旗戲鼓』之句。起云『樓前疏柳，柳外無窮路。』柳曰『疏柳』，則到杭時，秋意已深。」可備一說。陳思還因《宴清都·地僻無鐘鼓》有云「淮山夜月，金城暮草」之句，歸爲元祐五年（一〇九〇）廬州任上所作。

元祐八年（一〇九三）至哲宗紹聖三年（一〇九六），邦彥任溧水縣（今江蘇溧水）令。詞集中《隔浦蓮近拍·新篁搖動翠葆》《中山縣圃姑射亭避暑作》、《滿庭芳·風老鸞雛》（夏日溧水無想山作）、《鶴冲天·梅雨霽》（溧水長壽鄉作）顯然寫於此時。據強煥《清真詞叙》及王明清《揮塵錄》、《風流子·新綠小池塘》



也爲溧水之作。陳思《年譜》考訂《玉燭新·溪源新臘後》（早梅）、《紅林擒近·高柳春才軟》（咏雪）、《紅林擒近·風雪驚初霽》（雪晴）也爲溧水之作。

紹聖四年（一一〇九七），邦彥還，爲國子主簿。再度還朝時，寫了《浣溪紗·日薄塵飛官路平》、《瑞龍吟·章臺路》、《玉樓春·玉奩收起新妝了》等闕。從元符元年（一一〇九八）至徽宗大觀四年（一一一〇），邦彥大部分時間在朝爲官，先後擔任秘書省正字，秘書省校書郎，考功員外郎，衛尉，宗正少卿兼議禮局檢討。《應天長·條風布暖》詞中有「漢宮傳燭」、「飛烟五侯宅」，知寫於京城；而「芸香」特指秘書省，可推知此詞寫於爲秘書省正字或遷爲校書郎——元符元年（一一〇九八）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（一一〇一）期間。邦彥於建中靖國元年（一一〇一）曾至睦州。《一寸金·州夾蒼崖》題爲「新定作」，新定即新定郡，唐天寶元年（七四二）以睦州改名，治所在建德縣（今浙江建德縣東北梅城鎮）。乾元元年（七五八）復睦州。此詞寫的是睦州桐廬、建德一帶的桐江風光。《永樂大典》卷七二四一「堂」字韻，有邦彥《睦州建德縣清理堂記》一文，署爲「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十日，錢塘周某記」。文中景物描寫與此詞一一不謬。董棻《嚴陵集》卷八載《敕賜唐二高僧有師號記》一文，文中寫新定城中元符二年、元符三年及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七日敕賜唐二高僧師號一事，署爲「年月日錢塘周邦彥記」。故此詞應寫於建中靖國元年（一一〇一）。《黃鸝繞碧樹·雙闕籠佳氣》、《垂絲釣·縷金翠羽》，雖描寫京城中苑風光，但情緒較《一寸金》更爲頹唐，似寫在睦州詞之後。邦彥任京朝官期間於大觀二年冬（一一〇八）或下年春，嘗至蘇州，在蘇州

太守蔡密席上作《點絳脣》以寄意（詳見《新證》）；《綺寮怨·上馬人扶殘醉》也是蘇州重逢荊州歌女的寄概之作。

政和元年（一一二一）十月二十七日「奉直大夫、宗正少卿周邦彥直龍圖閣知河中府（今山西蒲州）」（《宋會要輯稿·選舉三三》之二六）。《風流子·楓林雕晚葉》、《掃花游·曉陰翳日》、《夜飛鵲·河橋送人處》、《渡江雲·晴嵐低楚甸》、《還京樂·禁烟近》、《大酺·對宿烟收》等詞，是詞中寫及龍門及長安者。龍門是河中府的轄區；而長安是永興軍路的治所。河中府宋屬永興軍路，因公往來當爲常事，所以詞作亦可印證邦彥曾知河中府。這類作品與少年游長安的明顯不同，是語及「郵亭」，更屢及「河橋」，即自同州府（今陝西大荔）朝邑縣（今爲黃泛區，縣已不存）渡河至河中府之橋。

政和二年（一一二二）至政和六年（一一二六）邦彥知隆德府（今山西長治）。《尉遲杯·隋堤路》寫於赴任途中。在此任上，曾寫《田子茂墓志銘》一文，署爲「奉直大夫直龍圖閣權知隆德軍府管勾學事賜紫金魚袋周邦彥撰」。約於政和六年（一一二六）六月後改知明州（今浙江鄞縣）。政和七年（一一二七）召還，爲秘書監。重和元年（一一二八）至宣和元年（一一二九）知真定（今河北正定），《蕙蘭芳引·寒螢晚空》當寫於出守真定時，《水龍吟·素肌應怯餘寒》（梨花）應作於真定任上。宣和二年（一一二〇）邦彥歸省錢塘祭掃，并移家四明。復歸錢塘時，遇方臘起義，寫《瑞鶴仙·悄郊原帶郭》。后改知順昌（今安徽阜陽）。宣和三年（一一二二）正月，赴處州（今浙江麗水）任，過天長道中，寫《西平樂·稚柳蘇晴》，旅死赴

任途中。

另外，游踪已至，不可確考者尚有揚州詞。《玉樓春·玉琴虛下傷心泪》、《少年游·檐牙繚繚小倡樓》、《倒犯·霽景對霜蟾乍升》皆爲追憶揚州的篇什。《青房并蒂蓮·醉凝眸》題爲「維揚懷古」，更是游踪所至的明證。《玲瓏四犯·穠李夭桃》用潘岳爲河陽令，多樹桃李花，人號曰河陽一縣花之常典。河陽在今河南孟縣一帶，周邦彥赴隆德府曾經此地，但時在秋季，與詞中所寫春景不侔，故此詞約寫於政和六年（一一二六）離任再經河陽時。然詞云「穠李夭桃，是舊日潘郎，親試春艷」。自別河陽，長負露房烟臉，似乎年輕時也曾爲官這一帶。

## 一一

《宋史》本傳稱邦彥「疏雋少檢，不爲州里推重」，幾乎成爲蓋棺定論。因爲關於邦彥詞的附會中，有所謂與李師師、親王舞鬟、溧水主簿姬、歌妓楚云諸女子的風流韻事。另外，宋代開始就有慕邦彥才名而溢美其襟抱者。強煥序邦彥詞，僅以於所治後圃，有亭曰「姑射」，有堂曰「蕭閑」，即斷言「可以想象其襟抱之不凡」。於周家有受塵之恩的樓鑰《清真先生文集序》中對邦彥人品贊不容口：「公壯年氣銳，以布衣自結於明主，又當全盛之時，宜乎立取貴顯。而考其歲月，仕宦殊爲流落，更就銓部，試遠邑，雖歸於班朝，坐視捷徑，不一趨焉。三縮州麾，僅登松班，而旅死矣。蓋其學道退然，委順知命，人望之如木

鷄，自以爲喜，此又世所未知者。樂府傳播，風流自命，又性好音律，如古之妙解，「顧曲」名堂，不能自己，人必以爲豪放飄逸高視古人，非攻苦力學以寸進者。」晚清王國維起而繼之，於《遺事》中謂：「宋時錢塘詞人，以先生與潘閔爲最著，而二人身後毀譽適得其反，可謂有幸有不幸矣。……知閔曳裾王門，納宦宦侍，至以布衣與人家國事，決非高蹈之士，徒以東坡盛稱其詩，陸子遜跋《逍遙集》，遂以楊朴、魏野比之，殊爲失實。先生立身頗有本末，而爲樂府所累，遂使人間異事皆附蘇秦，海內奇言盡歸方朔，廓而清之，亦後人之責矣。」又曰：「集中又無一頌聖貢諛之作。然則弁陽翁（周密）所記頗悔少作之對，當得其實。」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周邦彥仕宦正處北宋新舊黨爭之時。他的《重進〈汴都賦〉表》中又有言：「臣命薄數奇，旋遭時變，不能俯仰取容，自觸罷廢，漂零不偶，積年於茲。」使人頗疑其隸屬新黨，因擁護新法而爲舊黨所不容，因此多把他的升遷沉浮與新舊黨的得勢與否相聯繫。加之他在詞中閃爍其辭，高自標置，因此在後人印象中，邦彥風流放曠，不拘禮法，強項不屈，白眼向人；并有老莊出世之志，是樂天知命的高潔之士。邦彥不爲鄉里推重，很自然地也就被認爲是因爲寫淫詞艷曲，生活放蕩不羈，而被歸爲薄於操行的異類人群。然則以此推論，宋代大多數詞人都難辭其咎，北宋詞人恭肅如司馬光者也有艷詞綺事，但并不妨礙他「言行俱高」、「獨爲君子」。若不爲尊者諱，邦彥恐還有被當時清流所訾議的道德缺陷。不然，何以解釋時輩清流無一褒譽其人格之辭見諸載籍？最著者，邦彥叔父周邠及周邠摯友積極獎掖後進的蘇軾，在道德文章方面亦對邦彥不置一詞？

然邦彥自視甚高，詞中屢以「多材多藝」的良相周公旦自許。但觀其一生，雋聲美名，僅在辭章，却缺乏經世致用的應務之才。他舍進士而以三學進身，獻《汴都賦》一文，僅在「文采可取」；教授廬州，五年不遷；在溧水任上四年，不聞有德政、民懇留等記載，還是「雅嫻於文詞，一時稱爲才吏」（光緒修《溧水縣志》）。可見邦彥爲太學生、爲教授、爲縣令時，「益盡力於辭章」（《宋史》本傳），無補官吏之才器。邦彥紹聖四年（一〇九七）自溧水縣令還爲國子主簿時已歷九考，已够選人改官資序却未改官，顯然非因考課不足，而係舉主不足。推原舉主不足的原因，無非是政績不著或人品有可訾議處。入朝之後的邦彥，才德既不被當時掌權的新黨見知，對新黨也嘗懷憤憤不平之情，《瑞龍吟·章臺路》、《玉樓春·玉奩收起新妝了》就是證明。延至元符元年（一〇九八）經「哲宗召對」，「使誦前賦」，由選人除秘書省正字，改京朝官。邦彥以一賦再得人主之眷顧，可謂極盡儒生之榮，然則其才亦止於此矣。概言之，周邦彥從初入仕途到哲宗元符年間，即四十五歲前都是依官制之常，循資而遷；其不蒙超擢者，在於人品或有可訾，才干或有不足。而他的《汴都賦》與歷史上所有京都賦一樣，是「指陳事實，無誇詡之過」（樓鑰《清真先生文集序》）的泛泛頌揚之作，並沒有明顯的政治傾向。只是此賦寫於元豐七年（一〇八四），時在王安石變法之後，此賦歌頌神宗朝盛事，就是新法實行後的盛業，所以確實觸及到了宋朝新舊黨爭的政治敏感中樞，但并非表現了邦彥的政治立場與政治識器。所以在新法實行如日中天之時，此賦未使邦彥獲蒙超擢；而且邦彥除了初次外任與高太后秉政巧合之外，其餘幾次外任還朝均與新舊黨當權齟

齟參差。《重進〈汴都賦〉表》寫在哲宗紹聖，即志在繼承神宗偉業之時，而宋朝選人改官爲同品同階之「橫向轉移」，然選人跳出「選海」，有時比考進士還難。邦彥「命薄數奇」云云，不排除其中有政治投機成分。哲宗於元祐八年九月親政，邦彥不見遽升亦不見內調；徽宗崇寧元年以新舊劃正邪，正黨名單不見邦彥之名，均可證此說。由此可知，邦彥一生仕途的升遷沉浮，與新舊黨爭無涉。然而由《汴都賦》追根溯源，邦彥也許私心認爲自己仕途延遷，與當年舊黨執政不無關聯，因而常懷孤憤莫伸之怨。但邦彥在新舊黨之間，並沒有左袒右袒的明確態度。

文人不願作匏瓜之懸，汲汲功名者不乏其人。最著者如孔子周游列國，席不暇暖，但孔儒更規定了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的進身由其道的基本原則。邦彥自視才能宜參權要，因此不滿仕途的循資升遷，遽登要路之念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四十五歲之後，進入中年的邦彥被強烈的仕進欲望所驅使，放棄了儒家的進身原則，竟然不由其道而入顯達之途。宋初的新舊黨爭，正如柳詒徵先生在《中國文化史》中所說：「（宋神宗朝）新舊兩黨各有政見，皆主於救國，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，主張各異，遂致各走極端。縱其末流，不免傾軋報復，未可純以政爭目之。而其黨派分立之始，則固純潔爲國，初無私憾及利祿之見屬雜其間。」邦彥中晚年的政治態度，表面上看是擁護新政，但實際上還是挾私憾及利祿之見，以當權派能否給自己帶來仕途的顯達作爲衡量所謂忠奸的標準。邦彥正處新舊黨末流傾軋之時，所謂新舊黨爭也已變質成正邪之爭。他在忠奸劃然可辨情況下，竟然攀附誤國大奸蔡京及蔡氏集團，

周邦彥中年以後的交游以及在京或外放、顯達或沉淪的仕履可以佐證此說。由於宋代仕途升遷有嚴格的保任舉薦之制度，舉主與被舉薦人之間難免群分類聚。邦彥交游，略可考者多是蔡京及蔡氏集團中人。邦彥賀蔡京生日詩：「化行《禹貢》山川內，人在周公禮樂中」，用頌天子之辭貢諛蔡京，是為有過於潘岳遠拜路塵、清流為之齒冷的行為。蘇州太守蔡密即蔡京族子，邦彥為其席上賓。邦彥尤與蔡京心腹、曾為蔡京出計畫策排斥異己的劉昺過從為密。劉昺二十年不葬祖母及父母，士論不與，邦彥却為劉昺之祖作埋銘，而拒收潤筆之白金；劉昺因舉以自代為戶部尚書，此事雖未果，但在徽宗朝、尤其在蔡京當國期間，邦彥常常超轉，屢蒙超擢，遽至列卿，却是無可爭辯的事實。在徽宗崇寧元年（一一〇二）至徽宗大觀四年（一一一〇）這段時間裏，邦彥一直在朝為官，官運也最為飛黃騰達。直到蔡京為張商英、何執中等人所攻，於大觀三年（一一〇九）罷相，特別是受劉昺一事的牽連（詳見《新證》），邦彥才於政和元年（一一一一），再度外任河中府、隆德府等地。所以邦彥仕途顯達的原因，決非如王國維氏所謂「循資而遷」，而是官運一繫之於新黨蔡京集團人物特別是蔡京當國與否。邦彥約寫於政和六年（一一一六）隆德府任上的《田子茂墓志銘》一文，不辨是非、毀忠譽奸，尊稱呂惠卿為「公」，直呼范純粹為「奸臣」，更可以確證上述觀點。蓋邦彥其時耽於仕宦，曳裾侯門，不幸步武潘閔後踪。王國維《遺事》稱邦彥「於熙寧、元祐兩黨均無依附」，「晚年稍顯達，亦循資格得之。其於蔡氏，亦非絕無交際。蓋文人脫略，於權勢無所趨避」，難成篤論者已。

平心而論，僅讀周邦彥美侖美奐的詞章，很難得到上述印象。須知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可視為精神超越的方式。封建社會士子受正統儒家思想教育，當其行爲越出傳統規範，高自標置既是撫平內疚的精神安慰，也是彌補仕宦不達的精神滿足。如潘岳仕宦不達時，曾作《閑居賦》。潘岳在《閑居賦》中，表示守拙養巧，「資忠履信以進德，修辭立誠以居業」；「覽知足之分，庶浮雲之志。築室種樹，逍遙自得」，儼然既遵從儒家不義而富貴，於我如浮雲的立身原則，並能以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的思想修身養性。然富貴浮雲，絕利去欲，不辱於身，知可止則止，不殆於身——此種儒道互參的人格範式，與潘岳之輕躁趨利不啻霄壤，故後人有「高情千古《閑居賦》，爭知安仁拜路塵」之歎。文學是苦悶的象徵，作者完全可以持一己之主觀標準塑造人物包括創造自我。但并不表明潘岳式的自我創造，在實際生活中能得到認同。這也許能視爲作者創作作品時的人格分裂，它表現了人類潛意識中隱然求善的願望。邦彥人品雖然有污，但其詞作的內容纖塵不染，似也可以作如是觀。

### 三

周邦彥的早期詞作，沒有任何政治色彩。比如他的荊州詞、金陵詞、少年入長安詞、回故鄉錢塘詞、汴京游冶詞，都只是泛泛的離情、艷遇、懷人、懷鄉、懷古等題材。此時邦彥還是性情中人。我們看他的《少年游》一闋：「南都石黛掃晴山。衣薄奈朝寒。一夕東風，海棠花謝，樓上卷簾看。而今麗日明



如洗，南陌暖雕鞍。舊賞園林，喜無風雨，春鳥報平安。」此詞節奏是何等的明快，感情是何等的純淨，博愛大自然的赤子之心中，一縷懷人情愫悠悠嫋嫋，真可稱爲唯美的詞篇。當時的詞作只有《蘭陵王·柳陰直》諸闋，稍稍流露出倦游的情懷，然此亦少年文人附庸風雅，爲賦新詞強說愁的可愛常態。

周邦彥在溧水縣令任上四年的詞作已經有明顯的貶謫淪落的慨歎，并且把自己高自標置到了不適當的地步。其中《滿庭芳·風老鶯雛》可以作爲代表。詞上闋中的「地卑山近，衣潤費爐烟」，「凭闌久，黃蘆苦竹，凝泛九江船」，化用白居易《琵琶行》「潯陽地僻無音樂，黃蘆苦竹繞宅生」詩句，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被殺一事，越職奏言，鐵骨錚錚，被貶江州司馬。下闋「憔悴江南倦客，不堪聽、急管繁弦。歌筵畔，先安簾枕，容我醉時眠」，更在用典中寫自己有陶淵明「我醉欲眠卿可去」的真率，也有李白、屈原才高不遇的深悲。周邦彥引白居易、屈原爲同調，殊爲不類，頗使人疑惑邦彥此時已經卷入政治鬥爭的旋渦，身爲新黨而爲當權的舊黨所不容。此時的周詞中還顯露了道家的出世之想，溧水治所後園的姑射亭、蕭閑堂，皆是邦彥「取神仙中事，揭而名之」。詞作《鶴冲天·梅雨霽》（溧水長壽鄉作）亦云：「此時情緒此時天。無事小神仙。」即使是消極避世，周邦彥也自詡爲高卧隆中、襟抱不凡的諸葛亮和陶淵明「綸中羽扇，困卧北窗清曉。屏裏吳山夢自到。驚覺，依前身，在江表。」（《隔浦蓮近拍·新篁搖動翠葆》）

周邦彥還爲國子主簿時，欣喜之情溢於言外的篇什，只有《浣溪紗·日薄塵飛官路平》一闋。周邦彥還朝後，至元符三年（一一〇〇），雖經磨勘轉官，但一直都是從八品的小官，所以情緒很快轉爲低落。